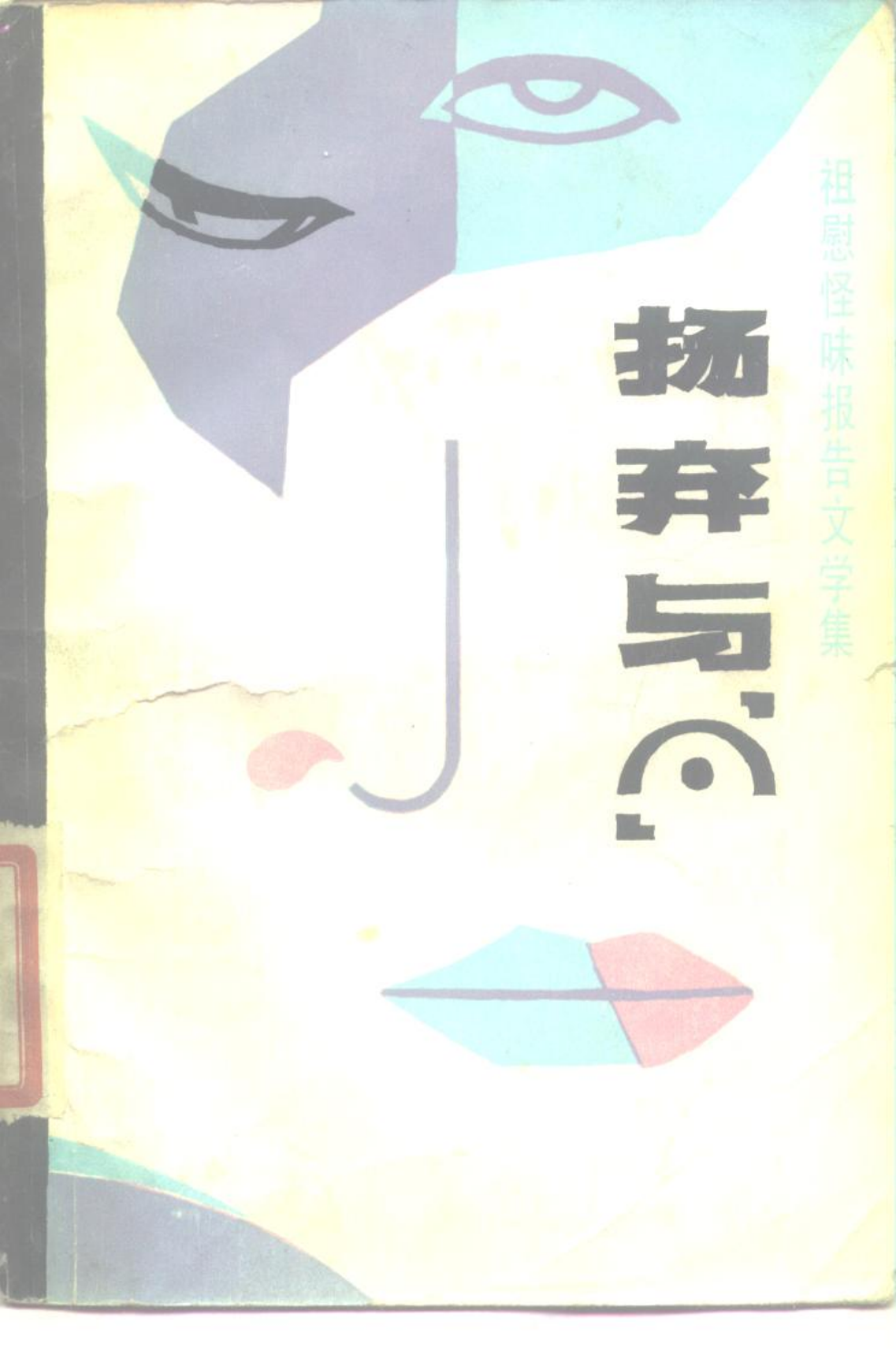


祖慰怪味报告文学集

扬弃与心



扬弃与“ $\odot$ ”

祖慰怪味报告文学集

DE29/10

1084707

扬弃与“0”
祖慰怪味报告文学集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 印张 插页3 223 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8300 册

书号: 10113·379 定价: 1.60 元



祖慰逗“祖宗”

目 录

春江水暖鸭先知（自序）·····	（ 1 ）
晶核·····	（ 14 ）
扬弃与“ ∞ ”·····	（ 44 ）
现代活力的“诊断”·····	（ 90 ）
“银耳大王”王事录·····	（111）
请你反塑·····	（135）
映日荷花别样红·····	（152）
他脑神游·····	（170）
祖国的T细胞·····	（192）
陈天生效应·····	（211）
动物演员的“现代启示录”·····	（225）
朱九思引力·····	（244）
深圳经纬·····	（251）
祖慰谈祖慰——对自我的文学报告·····	（298）

春江水暖鸭先知（自序）

——现代高智能人物塑造的断想

谁说历史不会重演？

我在编这本报告文学集校阅我的一篇篇作品时，象乘坐了超光速火箭，时间忽然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逆流而上，我活生生地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重新结识：武汉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校长，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家，深圳的企业家，武汉美术学院的雕刻家，福建原始森林中的银耳大王，武汉科学杂志的主编，洪湖湖面上的未来学家，上海杂技团的马戏演员，四十八年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祖慰……一点也不走样地重演了历史。

这次幸会当然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轻松和愉悦，但是奇怪的是，还有着“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惘和惶惑。于是，我在读着一个个自己写下的文字符号时，时隐时现地引发出近乎产妇分娩时的阵痛，分娩出一颗一颗的断想，但愿不是一粒一粒的“葡萄胎”。

怎么回事？我在本书里写的一些人物，为什么一个个缺乏鲜明的外在形象特征？是我的文学功力太差？要这样谦得发虚吗？我不是把这些人物的内在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世界的内涵，自我设计到自我实现的展开过程——给写出

来了吗？哈，莫非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变成了伦琴射线（X光），只能看骨骼、内脏，而看不见血肉皮肤？变成“X光文学”了！

《水浒》中的鲁智深，施耐庵是怎么描写其外在特征的？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穿一领皂布直裰”的和尚服，挎一口戒刀，提一把禅杖；随地大小便不讲卫生；一开口就是“酒家如何如何”。正是这些特征就与梁山泊其他107将鲜明地区分开了。而且，这外在的阳刚美的形象特征还对应着“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的内在豪侠性格。文静娟秀的外形拔不了杨柳树。古代靠体力取胜的拔山盖世英豪，一定是长得虎背熊腰、浓眉大眼的。普遍的内外对应。

可是，我写的武汉大学校长外在有什么特点？没有特点就是他的特点。长得瘦（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都会是这样），穿的是由大工厂大规模生产的“标准服”，没有职业特点，没有个性特点，甚至连年龄特点也不明显（他的白衬衣儿子能穿，儿子的白衬衣他也能穿）。拿的“武器”是亿万支标准笔中的一支。和千万人一样守法、守纪、讲卫生。说话没有“口头禅”，没有“啊，这个这个”填空废话，更没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种有地方语言特色的叠词，说的是普通话（十亿人规范化的话）。遣词用句上，在政治方面，和中央保持一致，在化学方面，使用着化学家们严格定义过的公式概念。语言的特点不在外在语音、语词、句式上，而在语言所包含的信息上。和鲁智深一比，确实太无外在特点了。但是，他是一位当代出色的教育革新家，一位不错的化学

家，——毫无疑问，堪称当代好汉。心灵如不断膨胀的星云，明明然、蓬蓬然；身体象日益坍塌的中子星，幽幽乎，瘪瘪乎。内外错位了，不对应了。

古代好汉，外在差异极大。打仗的武器种类繁多；而同一把大刀耍得也不一样，关云长耍的是拖刀计，一组佯败拖刀复又突然回身砍去的动作就把关云长内在品质反映出来了。现代化战争主要用导弹，大同小异。发射时都是按电钮，基本上用大拇指按，少数人用食指，绝不会用小指。谁也不能用描写相同的按钮的动作区分出各个不同的人物来。但是，现代人内在差异要比古人大得多！梁山108将虽穿戴、兵器、生活方式、语音语词各有差异，但是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却几乎是一样的：反贪官、清君侧；好汉间要拔刀相助；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可是现代人尽管穿戴、兵器、生活方式和语言标准化，但是在同一个行为上（例如发射导弹）各自的内心心理活动的差异就太大了。

古代人——外异内似；

现代人——外似内异。

有本未来学著作写道：“原始部落每一个成员，都是在同一种信息、同一个事件、同一范围的信念下成长的，因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些人作为个人是彼此不能分辨的。研究表明，有70%密诺明部落的印第安人具有相同的个性特征。他们似乎是精神复制品，是从形成个人特征的相同传送带上来的。”

现在明朗了，塑造人的内在精神的是信息。

凡在信息贫乏单一的地方，那里人的内在精神相雷同。但是，由于交通不发达，地域封闭割据，加上个体手工生产生活用品，因而就出现五花八门的方言，五花八门的民族服装，五花八门的风俗习惯，造成各地域人的外在差异很大。

现在，通讯卫星、航天飞机、电视、电话等现代交通工具及现代通讯手段，已使偌大的地球成了小小的太空村，造成全球外在方式的标准化。但是，由于信息产生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再加上信息在全球范围按光速流动，现代人都可以从获取自己需要而又与众不同的信息，于是，各自的内在精神世界就无限多样化了。

信息社会中的人物已不能用施耐庵的笔法去塑造了。如果当代作家还是极力去寻找人物的外在特征并通过这些特征去表现信息社会高智能人物的内心世界，那将会出现 $1 = 10000 \cdots \cdots 0$ 的算式错误。外在的描写已无足轻重，因为它不对应内在本质。

传统的文学圣条受到了痛苦的挑战！

中文系的课堂里，作家们的创作谈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毋庸置疑的语调说：“描写人物要写他干什么，尤其要写他怎么干的，这样，才能写出独具个性的这一个来。”武松，只要写他打虎和怎样打虎（不是用手榴弹或自动步枪，而是赤手空拳，因而显出了超人的英雄本色），于是，一下把这个出大力、流大汗的靠本能对象化世界的人物塑造出来了。

然而，要写信息社会中靠智能对象化世界的人的“干什么”和“怎么干”就令人棘手了。《他脑神游》中的出版家兼作家易征号称“出版‘软件’开发公司大老板”，他“干什

么”？答曰：想。他“怎么干”的？答曰：想好了就说。不是吗？他在办公室，在路上，在饭桌上，在与人对活中，在家里的书房中，全在想。契诃夫说过：作家的工作和别的工作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包括梦里）。易征就是一个无时无刻不是在用理性意识或潜意识工作着的人。一旦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就全部变成“说”了——找人谈是说话；打电话是说话；写成文章还是在用文字符号说话。由此可见，易征“怎么干”的全部内容就是没完没了的“说话”。这不奇怪，头脑里生产了有创造价值的信息，要变成对象化世界的物质力量，其唯一的手段就是语言表述。别说易征，爱因斯坦一辈子最有价值的活动也是“想”和“想好后写或说”。凡生产信息的人都这样。

易征的想、刘道玉的想，爱因斯坦的想……一切生产信息人的想，有什么各各相异的姿态吗？差不多，大同小异，总是“眉头一皱”啦，“凝望远方”啦，“托腮定睛”啦，可站可坐可卧，可动可静可又动又静，就这么些。问题还不在这外在动作大同小异，而在于怎么想的模样与想出的成果没有相关性。不会是托腮帮想才想出“相对论”，不托腮帮皱眉头就想不出“相对论”。可是，关公耍刀就不同，一般刀法斩不了六将，过不了五关，唯有拖刀计这一种要法才行。

我们这一代作家倒霉了！专职生产信息的人已不同于武松，不是写他们“干什么”和“怎么干”，而是转化成要写他们“想什么”和“怎么想”的了。“想什么”和“怎么想”全在大脑“黑箱”里进行，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表象化。即使能写一点想的表情、姿势，那又与“想什么”和“怎么想”并无对应关系。唉！这可怎么办？再看看他们想好后是怎么说的？现代语言的个性已不在语音、语词、句式，而在语言里

包含着特有的信息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是独一无二、最具个性的，不是他遣词用句不同于别的物理学家，而是语言（概念、符号、数学式等）里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独一无二的、最具个性的。而这些信息量的个性怎么表象化？武松打虎的过程及虎死的结果可以鲜明地表象化，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构思过程及其相对论的辉煌成果怎么变成栩栩如生的形象呢？

我写小说还没有这样的倒霉感和迷惘感，因为小说是虚构的，我可以照写高智能者的外在特貌、特衣、特动作，并把这些特与人物的特别情感、特别思想、特别成果对应起来，看来也能顺理成章，反正你们不信我信。可是，我一写报告文学就麻烦了，人是实人，不能编，只能筛选他身上的信息。我严重地感到，越是智能对象化世界的人，越找不到与他智能相对应而又能被鲜明感知的形象，总感到我在编纂人物的“语录”——因为他“怎么干”的唯一外化形式是语言。作家成了人物的“语录”编纂家了！

报告文学作者因为无权虚构，才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过敏反应。

倒霉啊！信息社会中的高智能人物怎么塑造呢？

知春的“丑小鸭”（不是“丑小鸭”了），除知暖以外还悟到什么没有？

没有。脑子一片空白，一片真空。

噢？——真空马上会吸进湍旋的空气气流来充填；台风就是低压区吸引高压区的气流造成的——想想陈天生这个人物（我在校阅《陈天生效应》这篇文章时忽然有所悟）。这篇

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全国十几家书报转载或收编，数千封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作者和陈天生本人。读者亢奋地表达他们结识了一个有多种智能效应的新人物。其实一点也没有写他的外貌、穿着，更没写他有什么特别的形体动作和特别的语言形态，那为什么读者会感到这个靠“想”靠“说”的人物很有个性特征呢？难道我的报告文学是抽象画，给人以抽象的色块，由读者自己去生产出具象的画面？不，同一幅抽象画让不同的观众看，绝不可能产生出确定的相似的表象，而我从读者来信中发现，他们读《陈天生效应》所产生的表象是确定而相似的。

我的看起来象语录汇编的、理念而抽象的作品中确含着一种另一维（或叫另一结构层次）上的表象。

到另一维去把这个表象找出来！

控制论的开山祖维纳，他知道动物和机器尽管都在动，但有着天渊之别的本质差异，但是，他居然发现血肉之物的动及钢铁之物的动有着共同规律——信息的流动及控制信息流动的共同规律！真伟大，越是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越伟大！

信息社会的“豪杰”说到底不就是表现在信息加工的效率及成果上吗？如何加工，是智能豪杰脑子里的事。要想知道，只有问他本人，他呢，只能用语言告诉你。如果你只写这一部分，那就全成了“语录”了。可是，在信息加工前有个信息输入的过程。一个“智杰”，其输入信息的方式一定有其独特性，而这个输入方式不是抽象的，却是有动作性能，具象的！

哎，有门！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独特的爱因斯坦，他向自

已输入信息的方式非常独特。他大学毕业后前景惨淡，在一家小专利局当职员糊口。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几个青年朋友，轮流在各家聚会，更多的是去劣等咖啡馆聊天。他们从休谟、斯宾诺莎、马赫、庞卡莱的哲学到黎曼的《几何基础》，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到莫扎特的奏鸣曲，都聊，而且热烈争吵（这是思维与思维的猛烈撞击）。这里没有权威，没有领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仅用自己所据之理，还加上嘶喊，甚至站到桌凳上去，以战胜论“敌”。这种粗野的、搏斗的输入信息的方式，使爱因斯坦获得了浓缩的、多学科的大信息量，并且，在输入信息的同时，逼迫自己快速加工，拿出观点来与对方相争。无论是“想什么”（多学科内容）还是“怎么想”（多学科的迅速杂交）都具象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外在的动作性都与爱因斯坦在那个时候创立伟大的相对论的智杰本质是相关的，对应的。

陈天生不也有他的输入信息和加工信息的方式吗？他一方面输入当今的政治信息，又输入希腊神话故事信息，马上杂交出一个“皮克马利翁效应”。他骑着自行车到处乞求出版信息，用湖北的九头鸟的加工信息策略，搞了个低位能效应。他也仿效爱因斯坦，聚了一帮朋友“吹牛”，吹出了全方位思考效应等等。这些输入信息和加工信息的方式既有个性而又具象！

刘道玉、朱九思、易征、朱世能和雕塑家、企业家、马戏演员及我自己，无不有自己一套输入信息和加工信息的方式，而且都是具象的。可惜的是，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并没有理性地意识到这些，是凭直觉经验写的，因而写得人物的“语录”过多，而具象的“想什么”和“怎么想”开发得太少。如果我现在来写，那肯定……

不要轻蔑人物的“语录”。人物的自述，正是自我精神世界的物质显示，用声音或用文字描述了自己加工信息（学术信息、情感信息）的方式及结果。维纳的控制论研究，不知道信息在动物或机器之内的通讯及受控过程，而只能把这内部机制“黑箱”化，搞一个假设的功能模拟，以研究信息输入受控之后的输出情况。作家呢，可比维纳幸运！虽然人物大脑里“怎么想”对作者来说是个“黑箱”，但是，可以请人物自己讲，使“黑箱”打开。

关键的问题是你诱导报告对象讲什么，不是去请人物讲某项试验的设计及试验反馈调整过程，因为那是各自专业范围内的事，只有同行才感兴趣。应该请人物讲自己生产某种创造性信息的过程中能够从中提取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这个方法就是练达人情、洞明世事的方法，也就是人生哲理，不是搞某项科学课题的方法。曹雪芹是把“练达人情、洞明世事”作为文学的灵魂的。此外，还要请人物讲在生产信息过程中的自己的情感过程，因为文学要靠情的载体载着“练达人情、洞明世事”的人生哲理向读者传输。

《现代人活力的诊断》中的主角朱世能，他的内心独白，给我描述了一个现代人生哲理公式：

现代人的活力 = 智力 × (毅力 + 精力 + 速力)

无疑，这个公式对全人类都有人生的方法论价值。

过去几千年的文学，几乎只提供政治的和伦理的两方面的人生方法论。人物的善恶美丑全由作者所持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来确定。

可是，现代文学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多元化了。萨特在

《厌恶》、《墙》、《自由之路》三部曲中提供存在主义，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提供“失败了的英雄”的价值观，福克纳在《喧嚣与愤怒》中提供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提供异化论……

现代人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有政治和伦理两个层次，而是多到无穷！只要有一种观察理论，就会观察到一个有趣的世界层次。

我们要报告那些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层次的人，把他们的观察方法用情的载体传输给读者，然后让读者也能看到人物眼中的新世界。《动物演员的现代启示录》中的启示录不是让人看到了“生物共荣圈”、“幽默乃是在高层次方向失去分寸感的感觉”及“人和动物都有着十分之九的天才智能和体能有待开发”等等有趣的“练达人情”的层次吗？《深圳经纬》也让人粗略地看到现代商业、现代旅游、现代工业的掠影和人们在这个环境中所出现的魔柜效应。《请您反塑》中的雕塑家们，用他们的“体积语言”给我们现代审美观念，看到抽象的、具象的、写实的、写意的等各种美的世界。如此等等。

今天，评定一个作品的价值，不能仅用政治和伦理两个规范去衡量它是否深刻揭示内在本质，尤其要看它能否提供一个令当代读者觉得有兴味、有意义而且是全新的人生世界层次。换一种表述，衡量一个信息型新人是否塑造成功，要看是否展示出了人物的独特观察“软件”和由这个“软件”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人生世界。

可是，那些带着新世界的人不会主动来找作家，而要作家去找。同理，如果作家没有全新的和人物相似的观察“软件”，新人物站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如果不懂点人才学、

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就不会把写的激情倾注于刘道玉，也就不可能提炼出两个“晶核”，最多写出一位吃大苦、耐大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个层次上的大学校长。爱因斯坦说过：“你能不能观察眼前的现象，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着你到底能观察到什么。”要塑造高智能人物，作家首先要有与高智能人物相似的观察人生的理论——新兴的边缘化的“软科学”。

我正在搞“软科学化”的文学，用软科学所提供的观察“软件”去找到新的大千人生世界，奉献给读者。

科学家不是通过自己的信息创造活动也在提供新世界吗？相对论展示了一个接近光速运动时空变异的奇妙世界；现代物理学提供了一个超感觉的神秘的亚原子世界，生物学揭示带密码的基因世界；未来学家预示历史前进方向上的第三、第四、第 n 个浪潮世界等等，都提供了新世界。但是文学提供的世界与他们的都不同，不同的不是展示的内容不一样，而是“味”不同。科学家展示的是中性的概念世界，文学家展示的是“酸”、“碱”俱有的情感世界。

作家要展示爱因斯坦所提供的相对论世界，不是去把爱因斯坦的表述及数学表达式抄一遍，而是给这个世界染上浓浓的情感色彩。因为，文学信息向别人心灵传输的唯一载体是情。

说到情，似乎是个最古老的命题了，还有什么新话好说吗？

有，当然有。情，是对生活体验后所表示的态度。

现代人的智能对象化世界的生活，必然有现代的情。

刘道玉总是愁容满面。这情放在武松身上就糟了，那还

算得了什么好汉？不过是写“好一个愁字了得”的李清照那样婉约病弱的女流之辈。可是，放在开创型教育家身上，却是一个有个性的当代智雄之情。刘道玉有着现代人的两个扬弃——不断扬弃错误的自我，尤其突出的是不断扬弃曾经成功的自我。要做到这两个非常困难的“扬弃”，必然要苦心吸收和加工信息，必然心理负压要大，必然会愁霜难融。愁，对健康有害；但对创造是极有好处的。

深圳人的显示欲，这种感情似乎与中国传统的谦虚之情不符合。刘备在“煮酒论英雄”时装成个大傻瓜，那种大智若愚的韬晦之情是古典英雄的美饰。可是，今天却要去投标显示，宣传自我，扩张自我，敢于迎接把握不大的挑战。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就指出，中美两国青年不同之点，中国人好谦虚，美国人好表现，因此，后者的创造意识强，成果大。显示之情是信息输入的抽水泵，显示之情是信息加工的催化剂，显示之情是信息输出的发射器。只要不是空喊不干的显示，就是应该赞美的现代人之情。

再说孤独感，也是被以往定为贬义的情感。可是爱因斯坦说：“我是一个真正孤独的人，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隶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周围的朋友，甚至于我的家庭。我孤独地生活在乡下，并注意到，单调的、平静的生活如何激发起富有创造性的思索。”孤独对于专司生产信息的人不是病态之情。古代智者诸葛亮都说过：“非宁静无以致远”。但是，这种孤独之情不是孤僻，而是信息系统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的封闭。封闭是为了高效地进行信息杂交和组合。

古代豪杰，大凡都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忠义之情，可今天，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崇尚“无义务的互补友谊模式”，一个交换信息的自由的松散结构。长江源头之水，